新思維 新姿態 新動力

——華商在亞洲新發展旅程的神聖職責與光榮使命

沈家燊 華燊發展(集團)有限公司主席

十八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一手抓反腐倡廉，一手抓深化改革，步步深入民心，更鼓舞了我們海外的華僑華人、港澳台同胞的信心和勇氣，也使我們華商對祖國的未來倍添信心。

在新形勢下，華商如何在亞洲區域的新發展中負擔起神聖職責與光榮使命，本人有以下看法：

一 發揮正能量 從自己做起

目前中國反腐敗的事實證明，官員的腐敗往往與商人的投機與謀取暴利的活動分不開。官員沒有運用手中的權力為民謀福，反而用於尋求私利，給投機商人有可乘之機。我們華商從改革開放初期至今，在國家的發展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和精力，伴隨着改革開放30多年帶來的寶貴機遇，華商也成長、發展、壯大起來了，我們應該清醒認識，要堅持正常的官商合作，實現官民共贏，絕不能搞官商勾結，不能作出任何腐敗投機行為。投資要有回報，靠的是科技創新、發展業務、拓展商機，而不是投機取巧、行賄勾結官員。

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，各項制度將進一步透明，權力也會進一步下放，必將營造一個更公平公正公開的營商環境。從短期內來看，可能會影響到一些利益集團的利益，也許會「傷筋動骨」，從長遠看卻有利於整體社會的繁榮穩定，更符合人民的利益。海外華人華商，洋裝雖然穿在身，我心是中國心。從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，廣大華商祖祖輩輩有着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和品質，這是華商的共同特點，愛國愛鄉是華商的核心價值，華商會也是以愛國愛鄉為宗旨的愛國商會，一以貫之地弘揚愛國主義價值觀。今天，所有華商更應該以高度的愛國主義責任感與開明的企業發展理念，順應市場的潮流依法營商，做深化改革開放的促進派、踐行者，認真地從自己提高營商水平做起。

二 堅持綠色環保 從企業做起

改革開放至今已有30多年時間，國內外形勢和觀念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，發展要注意綠色環保的意識越來越重要。最近世界天氣反常，環境污染加劇，各地城市頻頻出現霧霾天氣，嚴重危害了大眾的健康與生存環境。所以，一個企業能不能事業長青，能不能保持可持續發展，不能再單看他的營業額和利潤。如果企業不重視環保，還是走高耗能低效益的舊路，根本無法得到社會的認同和支持。

目前仍有一些加工企業，無論從耗能、污染方面都存在着嚴重問題，這些企業必須關停、改造。在重視環保方面，我們華商企業更要起到帶頭作用，認真地從自身的企業做起，即使自己可以有所損失，但絕對不能傷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，這也是我們華商立於不敗之地的最重要原則。

三 發揮獨特優勢 從商會僑團做起

華商具有得天獨厚的海外優勢，廣大華商旅居於世界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區，與當地社會有着非常密切的聯繫，建立了深厚的社會根基，也是祖國開展民間外交的重要力量。海外華商在中國新一輪的深化改革中，可以繼續發揮中國與世界各地聯繫的橋樑作用。如何做好愛國愛港、愛國愛澳，以及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大業的帶頭人，是我們華商和僑界領袖的神聖職責和光榮使命。

應該看到，只要堅持散發正能量，生財有道，在國家新一輪的改革開放大潮中，華商仍然商機無限，可獲豐厚回報。各僑商會、各僑團的僑領們，更應該從自身所在的僑團和商會做起，發揮獨特的民間外交優勢，堅定地愛國愛港、愛國愛澳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新的貢獻。相信隨着世界特別是亞洲的新發展，在世界商業之林中，我們華商必將以新思維、新姿態、新動力，成為更加鬱鬱葱葱、事業長青的一群！

（本文為作者於2014年4月11日在海南博鰲華商圓桌會論壇上的發言稿）

■沈家燊4月11日在海南博鰲華商圓桌會論壇上發言。

民主大出賣 陳李引狼入室

徐庶

發展民主，應該由香港人自己作主，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，要聽從外國老闆的耳提面命。陳李美國之行，為他們的政改方案爭取美國的認可，這是對香港民主最大的踐踏，說明他們遵奉的是奴隸主義哲學。他們卻認為，香港的民主，沒有美國的參與、沒有美國的認可，香港人就站不起來。這是賣港求榮。

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與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訪美，與美國副總統拜登會面，返港後又到處宣揚他們訪美的「威水史」，遭各界質疑是勾結外國勢力，為本港政改「添煩添亂」。李柱銘接受電台訪問時狡辯稱，在政改關鍵時刻到美國，對爭取普選「有好處」。對於李柱銘的荒誕謬論，各界齊斥李柱銘的行徑出賣港人。

充當美國最信任的代理人

陳李兩人應召到美國接受「賜見」，對主子恭順，如奉綸音，說明了他們是美國勢力最信任的代理人，他們此行是去美國聽從差遣，接受新的任務。第一，回來香港後，要宣傳「美國介入有理」論；第二，全力推行架空基本法的「港人最後決定香港政制」、「符合國際標準」的政改方案；第三，為「佔領中環」製造輿論，攪亂香港，對抗中央。

李柱銘走上電台大力宣傳這次爭取外援的「威水」。他居然說，爭取外國的支持是「有用的」，自鳴得意說：「03年23條立法爭議時，我亦有訪美，其後白宮、英國、加拿大及歐盟先後發表聲明，表明反對23條立法。」這就翻出了自己的底牌。他一直為外國人做事，基本法23條是要立法反對和禁止外國的間諜在香港活動，反對分裂國家和外部勢力顛覆特區政府的活動，當然違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，自然會受到西方的反對。

斯諾登揭發美國的稜鏡計劃，揭露英國的特務機關參與美國監視全世界的互聯網通訊和電訊計劃，侵犯了外國官員和各國人民的私隱。香港如果基本法23條順利立法，美國和英國的各種竊密行動，就不可能在香港進行。美國和英國的官員就不可能明目張膽在香港聯絡各個政黨，美國人不可能公然走進香港的校園，進行所謂「公民抗命」和「佔中」的演講，美國「民主基金」也不可能向香港的大學和政黨捐款。

如果將來按照「國際標準」進行政改，也就是按照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所說的，「香港人有最後的決定權」，即落實「公民提名」方案，那麼就可以選李柱銘或者陳方安生那樣的人物出任行政長官，在涉及國家主權、安全、發展利益的問題上，甚至什麼事情都要請示美國總領事館，或者被傳召到美國白宮進行密室商討，香港就成了美國的「衛星國」。在這樣情況下，才發生類似斯諾登的事件，可以馬上讓美國聯邦調查局拉人；美國轟炸了中國大使館，特區政府發言人將出面為美國辯解一番；香港的金融管理更要看着美國的面色做人，1997年特區政府狙擊美國「大鱷」的事情就不會發生。

「因為美國在香港有投資，香港是國際城市」，陳方安生和李柱銘就公然主張「外國的干預是正常的」，這分明是邀請美國介入香港的事務。這是強盜邏輯。美國人不方便說，由美國的代言人振振有詞地說出來更顯巧妙。這恰好說明，這次訪問，陳李和美國人是達成了默契的。

對外國老闆耳提面命賣港求榮

發展民主，應該由香港人自己作主，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民主，要聽從外國老闆的耳提面命。陳李美國之行，為他們的政改方案爭取美國的認可，這是對香港民主最大的踐踏，說明他們遵奉的是奴隸主義哲學。他們卻認為，香港的民主，沒有美國的參與、沒有美國的認可，香港人就站不起來。這是賣港求榮。

不僅僅賣港求榮，陳李還為「美國香港政策法」的恢復使用埋下伏筆，做起現代吳三桂「引清兵入關」。陳方安生和李柱銘要美國每年發表一次香港的政治和人權報告，由美國人指點香港要怎樣管理，就好像自動戴上鐐銬，失去高度自治權。若果香港不服從，美國就可以取消對香港的所有優惠待遇，實行經濟制裁。到時候，香港的金融機構和出入口企業，頭上掛起了一張刀，分分鐘被美國砍至鮮血淋漓，這就叫做引狼入室拉雞仔。如此一來，香港人不再是香港的主人，美國才是香港的主人。

最令人關注的是，陳方安生在香港發表了「香港2020」的政改方案後，立即前往白宮，向美國的政要投訴，她的政改方案不被中央所接納，希望美國政府施加壓力。這個方案的特質是，先進行公民提名，單議席單票選舉317個分區直選的提名委員會委員，反對派只要掌握160個分區直選的提名委員會議席，就可以順風順水把西方認可的候選人送到行政長官的候選人寶座上，真正做到了美國認可、「香港人最終有決定權」的普選。可見陳李美國之行，是出售民主權利，給港人扣上鎖鍊，向美國表忠之行。

公民黨上海行一黨四立場原因為何?

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

上海之行曲終人散，此行成果外界言人人殊，但上海行就像一面照妖鏡，將一些政黨內光怪陸離的現象表露無遺。其中儼然以反對派龍頭自居的公民黨，其立法會議員在上海行竟然出現四種不同的立場：毛孟靜、陳家洛堅持不去，抗拒溝通；梁家傑突然「甩底」，自相矛盾；郭榮鏗、郭家麒又想溝通，又要搞事；而湯家驊則一直主張對話，但猶如黨內「異端」。上海行是與中央官員溝通的重要政治行動，但公民黨6名議員卻出現了四種立場，激進、溝通、對立、左右逢源都有，這說明了什麼？這既說明了公民黨是一個極之「自由」的政黨，黨員可以自行其是，說得難聽就是沒有黨紀，梁家傑掌控不了黨內派系。另一方面也說明公民黨是一個投機的政黨，在政改尚未有定案之時四處下注，以尋求最大的政治利益。但機關算盡太聰明，只會進一步暴露公民黨的投機黨格而已。說到底，一切都是為了余若薇參選服務。

公民黨對於上海行的態度可以用「詭異」來形容。當特首宣布有關行程之後，作為中央官員與反對派議員一次重要的會面，各個政黨理應三思而後行，至少也要召開會議才作出決定。但在梁家傑、余若薇仍未就上海行表達立場之時，黨內屬於最激進一翼的毛孟靜、陳家洛立即表示不會參與，並指行程沒有意義云云。毛、陳兩人都是公民黨立法會議員，對內有「黨團」的約束，在關係黨政策的問題仍然自行表態，這教梁家傑等人情何以堪？而且他們將行程一棒打死，說沒有意義，其他黨友還是否應該參加？顯然，兩人完全是無視領導層，並意圖主導黨內決策。

黨內立場各異號令不行

及後公民黨終於決定參與行程，並且強陣參與，余若薇更多番呼籲反對派盡量出席，公民黨此舉不過是為了凸顯反對派內的龍頭地位。但對於黨的決策，毛孟靜、陳家洛依然不理會，梁家傑也沒有辦法。當出發到上海，繼而發生了梁國雄違禁品被扣查事件，這本屬小事一樁，梁國雄類似的「政治騷」已上演過不少遍，公民黨怎會不知道？但最終公民黨的態度突然一百八十度轉變，梁家傑在晚上宣布不會到上海，但奇怪的是已到了上海的公民黨議員卻可自由選擇是否出席。梁家傑不是一般議員，是公民黨黨魁，他如果決定不出席即是代表整個黨的決定，怎可能讓其他人自由選擇？他究竟是自由至此，還是指揮不靈，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在上海的公民黨議員只剩下郭榮鏗郭家麒、湯家驊。但原來他們又有不同立場，郭榮鏗、郭家麒兩人在黨內屬於中間派，這是好聽的稱呼，實際上是騎牆派，西瓜靠大邊。在梁家傑宣布自由活動之後，「雙郭」再次表現出左右逢源的取態，一方面他們沒有隨大隊參加參觀活動，反而走到上海交通大學派單張搞事，爭取傳媒曝光；一方面他們又繼續參與座談會與中央官員交流政改看法，完全是兩面抽水的做法。而湯家驊則一直屬於公民黨內溫和力量，主張理性務實討論政改，比較而言，他的立場是最一以貫之，沒有受到一些枝節影響，沒有隨梁國雄起舞，始終堅持溝通，政治品格明顯高出其黨友。

政治立場就是讓余「入閘」

上海行是與中央官員溝通的重要政治行動，但公民黨6名議員卻出現了四種立場，激進、溝通、對立、左右逢源都有，這說明了什麼？說明了兩個問題：一是梁家傑缺乏統領全黨的聲望和能力，毛孟靜與黨內一班大狀交惡早已不是秘密；陳家洛被余若薇取去黨主席之位也心有不甘，自然對領導層若即若離。至於其他議員也是各有山頭，梁家傑自然難以駕馭一大班諸侯。再者，毛孟靜、陳家洛等人的政治立場也與梁家傑等人不盡相同，例如毛孟靜基本上已是激進勢力一員，與范國威合組所謂的「本土派」，這些人又怎會聽從梁家傑、余若薇指揮。所以，在上海行上，公民黨便出現了立場各異、號令不一的奇怪現象。

另一方面，說公民黨在政改上缺乏統一立場也是不公平，公民黨在政改上是有立場的，這個立場就是確保余若薇「入閘」參選特首選舉，而不論激進或是溝通路線，都是為了這個目的服務。所以，公民黨其實也不介意黨內成員四處下注，激進對抗下注、溝通路線也下注，變相縱容黨員選擇不同立場，總之一切以利益行先，這就是公民黨的立場。但如此缺乏立場、缺乏黨格的政黨，可以得到市民支持嗎？公民黨不要當市民都是傻子。

從內地多買電需注意的事項

周全浩
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訪問教授
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

政府於上月展開能源諮詢，檢討本港2020年後的發電燃料組合，並將與兩電商討2018年後本地電力市場的長遠發展。諮詢文件提出兩個方案，因考慮到部分市民自福島事故後憂慮核安全，政府建議維持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兩成電力。方案一建議效法澳門，以非專線(non-dedicated line)從南方電網輸入三成電力，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增至四成，煤電的比重銳減至一成，使內地電力佔本港整體電力供應的一半。方案二則建議把天然氣的發電比重提高至六成，煤電的比例降至兩成。惟從內地多買電力存在許多不明朗因素，犖犖大者，本文將從供應穩定性和成本兩個方面，作探入討論。

須保障本地電力供應安全

首先，從內地買入電力的供應穩定性，一定比本地發電為低。內地經濟發展蓬勃，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進行，金融業和銀行業發展輝煌，工業發展風馳電掣，人均收入提高，愈來愈多人追求電氣化生活，故其電力需求增長得十分快，如裝機容量的增長速度追不上，便會缺電。未來區內是否有足夠剩餘電力供給香港，成為疑問。調查顯示，兩電每年平均停電時間為兩分鐘，而南方電網則約為五小時，可見南方電網的供電穩定性比兩電低。鑑於內地近年經常發生停電及斷電事故，不少港人擔心，聯網後如遇內地斷電，本港亦被波及。

若要從內地買入電力，政府必須設法降低缺電風險，保障本地供應安全。例如政府可運用專線(dedicated line)從指定的電站輸入電力，一方面電力將優先供港，另一方面，一旦發生事故，香港可追蹤缺電源頭，要求南方電網「對症下藥」而恢復供電。這亦是香港從大亞灣進口核電的輸配電模式。現時南方電網的裝機容量達二十萬兆瓦(Mw)，如以非專線供電而不清楚輸入的電力來自何處，一旦缺電，將不能即時「對症下藥」。

固然如南方電網願意向中央政府承諾，發生事故時電力優先供港，可大大提升本港供電安全的保障。前提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須要共同參與，兩電和南方電網的電力貿易談判，才有利達成具約束力的「優先供港」條款。若只有兩地業者進行協商，沒有官方參與，談判將困難重重 。

環保與電費要作出取捨

既然本港發電的供電穩定性比輸入內地電力高，而兩個方案成本相若，香港自行生產天然氣電力，似乎對香港長遠發展比較有利。諮詢文件提到，香港沒足夠土地興建新的燃氣發電機組來應付需求，但這個說法不太確切。

以中電為例，爛角咀發電廠的八台天然氣發電機組，在1996-2006年陸續投產，廠房另預留額外土地作擴建用途；青山燃煤發電廠A廠房，於1982年投產，至今已運作30多年，將來機組老化而陸續退役後，可考慮把它重建成天然氣發電站。如是者，這些空間足夠中電多年使用。又如港燈南丫發電廠，在九十年代填海擴建，當時計劃可容納八台天然氣發電機組，現只有兩台投產，還有空間多建六台機組。可見香港不缺乏土地。

若選擇提高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至六成，社會需要面對一定的加電費壓力。天然氣雖然環保，但其發電成本比傳統火電貴。加上香港不生產天然氣，全部燃料依賴進口，進口價格跟隨國際能源市場波動，政府和兩電都欠缺價格主導權。近年國際油氣價不斷飆升，新簽定的買氣合同會比傳統氣源貴，造成加電費壓力。這是追求環保的交換條件，視乎市民如何取捨。

再說， 從內地輸入電力的成本因素亦不明朗。雖然黃局長多次叫港人放心，舉例指貴州水電的發電成本約為每度電三毫，推論內地買電成本一定比本港發電成本便宜；但結論猜測成分重，市民宜謹慎看待。

局長所指的「發電成本」，只計算內地水力電站的營運成本，不包括輸配電成本及南方電網的利潤等。以澳門為例，從內地買電的成本為每度電約0.8元，電力售價則約為每度1.3元。香港從內地輸入電力額外成本亦不菲，如需動輒數百億元鋪設跨境輸配電網，及包括兩電和南方電網的利潤等。因此，最終買電成本未必如黃局長所言般低。

現時政府主張以非專線供電，將增加議價談判的難度。南方電網的發電燃料組合中，六成二為火電，三成一為水電，核能和風能各佔6%和1%。若以非專線供電，香港則無法辨析輸入電力的發電方式及來源地，使訂價困難。南方電網會如何釐定「成本」，將充滿許多未知數。

買電成本取決於兩電和南方電網的議價談判，但兩地業者存在利益矛盾，如只有它們討價還價，將難以定出雙方均認為合理的價錢。南方電網雖是國企，但遵循商業原則運作，期望賺取合理利潤，而兩電則希望買電成本愈便宜愈好，一方面好向市民交代，另一方面可紓緩天然氣發電成本的上漲壓力。固然，倘得兩地政府共同參與談判，扮演平衡角色，相信可有助兩電談得比較合理的價格。